



楚文化在“五个特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 黄道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刻总结,也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又一次文化宣言。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助于我们更

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更有效地承担起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立国历史最长之一的诸侯国,楚国创造了与中原文化竞相争先、成为华夏文化南支的楚文化。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楚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楚文化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江汉地区是楚国的核心地带。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为楚国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位于荆州市纪南文旅区郢城镇郢北村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曾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我国第一次大面积揭露原始人类在平原地区的居住、生活遗迹,展示了原始人类从山地走向平原、从山洞穴居到平地起屋的发展历程,填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该遗址的上限距今约5万年,下限距今约1万年。刘玉堂先生说:“我们可以推测,鸡公山旧石器文化的主人,只要没有因遭遇特别严重的天灾人祸而灭绝,即使不

是现在湖北人的远祖,也会在现代中国人的远祖之列。”

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可以分为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三大文化类型,这三大文化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有明显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共同构成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在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长江中游一带活跃着一个势力很强的原始部落——三苗,俞伟超先生首先指出,江汉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张绪球先生也通过对三苗活动的范围,在长江中游的时间及其兴衰过程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进行详细比较,得出结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迟从屈家岭文化起,到石家河文化结束,都是由三苗所创造。”因此,长江中游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成为后来楚

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

梳理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轨迹,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混沌蒙昧到开化文明,这里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一方热土。远古楚先民在这方土地上开辟草莱,生生不息,创造了原始质朴的远古文明,为光彩夺目的楚文化涂上了厚重的底色。而三苗部落对江汉地区的早期开发,则为此后在此立国的楚国奠定了基石。作为祝融后裔的楚人,由北至南进入江汉平原之后与土著楚蛮逐渐融合,发展出影响深远的楚文化。这一清晰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史实。

楚文化丰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武王灭掉纣国后,不再将其分封给贵族,而是将其改设为权县,作为楚王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楚国首创县制,影响巨大且深远。秦国在诸侯国中率先效法楚国实行县制,统一中国后将郡县制进一步推向全国。直到当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楚国吴起变法以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要早30余年,他取消贵族特权、整饬吏治、奖励耕战,其开创之功,彪炳史册。

在经济上,楚国形成了一套大小额币种配套、等量货币与称量货币俱用、中央货币与地方货币并存、本国货币与邻国货币相衔接的完整货币体系,在列国币制中居于领先地位。

在科技方面,楚人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漆器制作、丝织刺绣、铜铁冶铸等方面,都创造了让后人称奇的创新成就。特别是青铜冶铸,楚人后来居上,发明了鬼斧神工般的失蜡法铸造,在合金配比、复合铸造、铸锻技术等方

面的创新,也无不令人称绝。

楚国的哲学艺术创新成就,在中华文化中一直独领风骚,影响深远。东周以降的中国哲学形成和发展,北方以儒家为代表,南方以道家为代表。出自楚国故地的老子和寓居楚地的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立者,合称“老庄”。而道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楚人代先王鬻熊立言的《鬻子》。同哲学一样,先秦文学也是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南方散文的代表是《庄子》,诗歌的代表是《离骚》和屈原的其他作品。后世将二者合称“庄骚”。楚文化在艺术上的成就,得益于楚人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先秦楚国人神杂糅巫风炽盛,是一片充满奇幻而浪漫的土地,赋予了楚国先民富于想象、充满激情的艺术精神,楚人因此创造了恢诡谲怪的艺术。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目醉神迷的美术等,都是楚国先民留给中国艺术史的宝贵财富。

楚文化助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但这一形成有着长期的融合发展奠定的基础,楚国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八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楚国的疆域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蕞尔小邦,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开疆拓土,由弱变强。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称霸中原,“天下大事尽在楚”。楚庄王位列春秋五霸之一。楚宣王至楚威王时期,楚国发展生产,加强武装,奋力东拓,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史称“宣威中兴”。怀王六年(前323年),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病逝,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此后的十余年,楚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也是第一强国。

随着楚国疆域的不断扩大,楚人的身影出现在南中

国的各个角落,输出、传播自己的文化。自春秋以后,楚人不断南下的过程,也就是囊括、融合南方夷越的过程。鼎盛时期,楚人南达五岭,西入川黔,北濒黄河、东抵海滨,统一强大的楚国既是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又是联系江、淮、河、湘各个族系的纽带,更是南北文化交流互动的强力推动者,实际上是南北各族融合的驿站。张正明先生还认为:“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联系东西南北以及融合华夏、蛮夷的作用,这对后世南方与北方的统一有重大的意义。”楚人的这些作为,无疑为此后我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即使是在楚国国势衰落的楚顷襄王时期,楚国也对开发、融合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楚将庄蹻奉命率

领军队伍往西南方向进军,攻占夜郎国,进入云贵。但是秦国的军队截断了他的归路,他只能一边和秦国作战,一边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由于他一直回不到楚国,所属的部队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庄蹻把楚国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入到滇池地区,促进了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为笼络人心,庄蹻主动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庄蹻因此成为史册中内地开发云南边疆的第一人。庄蹻入滇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汉人融入少数民族的事例之一,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了良好条件。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楚文化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原文字。张正明先生分析道:“可以推想,楚言与夏言原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由于楚人长期与诸夏交往,使用诸夏的文字,诵读诸夏的典籍,有很多楚人就学会了夏言,而楚言也逐渐与夏言靠近了。”在科技和艺术上,中原地区也是楚国长期学习的对象。楚国青铜铸造、丝织业的突飞猛进乃至后来居上,得益于长期向中原先进地区的学习、借鉴。楚国还主动吸收中原礼乐文明。

楚文化的博大,也是向长江流域各文明学习、融会的结果。上游的巴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如楚人,但楚人仍然十分注重吸收巴文化的因素。楚人有着发达高雅的音乐,但对巴人的俗曲喜爱到以至狂热的地步,成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就是对此的生动写照,成为中国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为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华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明吸收扬弃,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和创造力。楚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正是这一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楚民族是一个具有开放融会精神的民族,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善于兼收并蓄,乐于择善而从。作为先秦的重要文化支柱,楚文化从茁长而至鼎盛的过程,就是融会与传播的过程,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又绽放出独特的无穷魅力。楚文化的博大包容,是中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后来居上的文化,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是楚文化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向中原文化学习,首先是学习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微观视角来看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和谐,从宏观视角来看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要和合共生,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鬻子》中可以看出,楚人先祖鬻熊在辅佐周文王时,就提出了“和”“合”的治国之道。《鬻子》卷一云:“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和与道,帝王之器。”老子更是鲜明提出了“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和谐理念,这既是老子的智慧,也是楚文化的智慧,和谐理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田,萌芽、茁长、开花、结果。仅5000多字的《老子》,成为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人类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专门有一个章节,反映“止戈为武”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传递中华儿女自古以来追求和平的愿望。“止戈为武”这一和平思想,最早由楚庄王提出,反映了楚文化中追求和平、体恤民生的精髓。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晋大战,楚庄王亲自征战,楚军大获全胜。楚国大将潘公提议修筑一座“京观”来炫耀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敌军尸体堆积成山,

参考文献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 张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大论断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我们就难以更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难以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也不可能有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文化主体性让我们意气风发、昂扬向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信心百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如何解决好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背后,体现着文化主体性的强弱。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让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

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根本遵循,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文化方向,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载8月8日《人民日报》)

党建引领微治理 两级两长联十户

□ 王康 王凌志

自开展共同缔造工作以来,监利市委市政府聚焦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出了以“两级两长联十户”治理方式为基础的“十户联治”湾组微治理机制,实现党建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参与感。

明确两级,筑牢底座。镇村两级是“十户联治”的神经中枢,树立“大党建”理念,明确乡镇党委、驻村工作队和村(社区)党组织共同参与“十户联治”工作中来。乡镇党委班子包村,指导村(社区)制定联户长、中心户长工作机制,利用群众(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支委会议、村委会议等载体推动“十户联治”工作持续开展。村(社区)党组织包组(队)和驻村工作队联户,通过四议两公开、定期走访群众等方式,收集问题、解决问题、传达信息,达到谋划工作、推动工作、落实工作的目的。2023年以来,全市54个共同缔造示范村(社区)探索运行“十户联治”湾组微治理机制,福田寺镇福田村“五多五共”工作法被省市媒体报道。

选好两长,激活细胞。明确责任主体,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村“两委”干部担任联户长,每名联户长联系不少于2名中心户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联户长与中心户长组成党小组,联户长为组长,指导中心户长开展工作,收集并解决中心户长反馈的问题,形成群众小事党小组会后办、难事村党组织审议后办的工作机制。联户长每季度组织“十户联评”活动,根据“5+N”(即人居环境整治、平安创建、城乡规划管控、禁烧禁烟、人情风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加阶段性、突击性工作)工作完成情况,联户长组成评审团,根据“十户网格”平时表现情况和上级考核评价,每季度对“十户联治”工作进行评审,分片选出1名优秀中心户长和对应的“十户网格”,以村“两委”名义进行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目前全市共同缔造示范村(社区)共选出486个联户长和16000余名中心户长,群众参与率达到了80%以上。

联系十户,打通末梢。发动群众自治,从10户左右村民中推选产生1个中心户,由中心户户主担任中心户长,中心户长人选以党员、退休党员干部优先,同时满足群众认可、热心公益、无信访经历、致富能力强等特点。中心户长根据联户长的安排和联系群众的提议,选择固定区域,在不违背农事的情况下,随时召开十户会、墩台会、田坎会、板凳会等形式的议事会,协调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急难事、期盼事”,形成“五事共议、五事共治”。联户长根据任务情况和工作实际,下沉到“十户网格”,参加群众会议,小范围、面对面地解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进行政策答疑,实现问题提出即处置、落实即反馈,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做到千群交流“零距离”。近年来,荒湖管理区落实“十户联治”湾组微治理机制,解决群众诉求7000余件。

(作者单位:中共监利市委组织部)

张绪球、王明钦主编:《荆州楚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张正明:《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刘玉堂主编:《楚脉千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